



1939年,黄博明在车间工作。 黄朝晖 提供

◀上接 B02 版

他在为事务所办理移交手续,被国民党接收要员发现他能说中日两国语言,而且还会讲一口海南话。他立即被扣留。这个与海南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日本人,正是接收部队最急需的特殊人员,日本军队留下的军车兵器正急需整理翻译,配合清点的工作便落在他身上。他随着国军军队沿着海南东海岸一直到三亚的田独铁矿,一路上协助中国军政机构接收日本撤退遗留下来的所有物资。一直忙碌到1946年6月,他才回到海口,此时日本军队已经在3、4月份时被美国的军舰遣送回国,他所供职的明治制糖社也撤离海南,从此,他与改变自己命运的公司相隔千里,杳无音讯几十年。

个人在历史面前,该如何承担? 1945年8月战争结束后,作为日本人的斋藤博明,面临着人生的重大选择。

让我们来看一看斋藤博明的日记:

“我来到位于海口骑楼老街的明治糖社总部,发现总部同事匆匆忙忙,办公室也凌乱不堪,原来总部在做撤退前的准备。此时,我百感交集!战争的早日结束,是我一直期盼的,但是战争结束后,我又该何去何从呢……”

身为一位中国女子的丈夫,斋藤博明在残酷的战争中也受到毒打,他的厌战情绪时时流露在他的日记中:

“五年间的战地生活,无数次被日本军人、军属殴打。战争结束,又被日本抛弃,如今应该是我放弃日本的时候了。如果回去还是被侮辱和奴役的话,不如我现在就放弃。”

此时的斋藤博明已经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他如果独自回到日本,那么,他年轻的中国妻子和幼儿该怎么办?

经过多次彻夜难眠,他终于作出了人生的重大抉择:留在中国。他要养育在战争中生下的孩子,他要以个人行动为这场侵略战争赎罪。

但是,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决定。虽然日军侵琼期间,他没有拿过枪杀过人,但他是铁桥的设计者,这座桥是日本对海南岛资源掠夺的罪证,斋藤博明始终无法摆脱这强烈的

罪感。

但决心已定,他准备着要为他决定付出任何代价。

中日邦交,“战亡”的斋藤博明祭拜自己

2014年8月,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南琼海采访黄博明长子黄关熙。年过古稀的黄关熙回忆:“战争结束后,我父亲留在海南。父亲当时很辛苦,他给人家打铁,打铁赚不了钱他就去修汽车,当时的车很少,也赚不了钱,就到碾米厂给人家打工,当时的工作很辛苦,所以他们养大我很难。”

1950年,日本千叶县政府经过多年寻找,也没有得到斋藤博明的音讯。家人接受千叶县政府宣告斋藤博明的死亡,并把他的“遗骨”送到家族墓地,修建坟墓,从此,斋藤博明成了家族“战死”的“英雄”,年年接受香火的“祭拜”。

就在日本宣告斋藤博明“战亡”之际,已经改名为黄博明的斋藤在中国海南开始新的人生。而他的后半生与日本明治糖社的重新相逢,为他的人生增添传奇色彩。

黄博明的孙子黄朝晖说,1973年中日恢复邦交,爷爷患肺结核,在医院看到日本药品,制造商为明治制糖株式会社,他就按照地址写信给公司,与新元久先生取得联系。

新元久,是黄博明的原来的上司新元八丈雄的儿子。他生于1933年,日本东京大学毕业。此时正在明治果业株式会社工作。

可以说,如果没有1973年的“中日邦交”,斋藤博明这个名字便永远不会被记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以及新元八丈雄就永远隐藏在黄博明的人生字典里,不为外界所知。

2014年6月,海南日报记者赴日本东京采访新元久先生。年过80的新元久依然步履轻盈,记忆清晰。喜欢弹钢琴的新元久先生在他的家中为我们弹奏一首《思乡曲》。欢快的旋律却掩不住淡淡的忧伤。故乡、亲人,是我们永远的念想;喜乐、平安,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他回忆:“大概是在1973年的时候,中日恢复邦交,那个时候我在明治糖社巧

克力研究所研究开发新产品。有一天,我接到总公司的一个电话:新元先生,您认识海南岛一个叫黄博明的人吗? 我说不认识。原来是黄博明给他寄了一封信。信里是这样写的,中日恢复了邦交,我终于是可以给日本写信了。很久以前我是明治制糖的社员被派到海南岛工作,那个时候我的上司是新元八丈雄。如果我能再回日本,我非常希望能拜会他,能帮我找到他的地址吗?

新元久先生告诉我们:“我的父亲当时是海南岛蔗糖业开发第一责任人,我想黄博明先生应该是那个时候和我父亲一起工作过的人。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有了很多书信往来,在信里面他告诉我他的日本名字叫斋藤博明,因为各种原因,战败后他没能返回日本,现在在海南岛工作。”

新元久与黄博明从未谋面,凭着他是父亲当年的员工,他极力帮助“死去”的黄博明回到日本。1979年,黄博明终于回到离别整整40年的故乡——日本千叶县。在给自已的墓碑献花时,黄博明感慨万千:战争给人类造成了多少灾难,而自己祭拜自己墓地的人,又何止我一个!

牵挂海南,第二次放弃回日本

这一年,黄博明已是花甲老人,在中国已是退休年龄。新元久和日本的亲人劝他恢复日本国籍,在日本老家安度晚年。千叶县和明治制糖株式会社也提供丰厚的条件,只需他的决定。然而,黄博明已经离不开海南。他已经很熟悉那片他付出太多的土地。那里有他的爱,有他的亲生骨肉,尽管物质条件还很差。就像当年决定留在中国一样,这次他也毫不犹豫地拒绝回到日本,这让他亲人和朋友不可理解。

这是黄博明第二次放弃回到日本。喜欢贝多芬的黄博明决定握住自己命运的咽喉。他与新元久先生多次谈起,他在中国已经找到人生的价值。此时,刚从文革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的中国更需要科学技术人才。1984年,黄博明作为海南农业机械考察团的成员再次来到日本。东京大学严格的学术训练和日占时期自己的实践经验,让他在海南工业界很快脱颖而出。他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主持建设的工厂仍遍及全岛,达到40多家。海南工业龙头企业海口罐头厂由黄博明主持设计,那些超前的设计理念为海口罐头厂(椰树集团的前身)带来巨大的收益,成为海南工业界的一面旗帜。黄博明以优异的能力和工作业绩,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认可,1992年,黄博明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他当初选择留在中国的人生价值似乎得到了报偿。

2015年7月,我们来到黄博明生前工作的海南省机械工业总公司,1994年黄博明74岁

高龄从公司总工程师的位置退休。在海秀路黄博明的居所,整齐排列的一排排书籍是屋子里最主要的财产。2007年主人谢世后,这些陪伴黄博明一生的书籍被蒙上了些许灰尘。

与晚年黄博明对门而居的原省机械工业总公司党委书记蔡家万向我们介绍,1950年海南解放后,黄博明因技术出众,精通日语、德语,得到了新中国重用。1955年,经过严格审核,黄博明进入海南行政公署工业处任工程师,从此,黄博明开始了一生漫长的“赎罪”过程。百废待兴的海南极其需要他这样的技术人才,他没有被当做“敌人”,这是他一生中最感踏实和欣慰的日子。东京大学严格的学术训练和后来的实践经验,让他在海南工业界很快脱颖而出,黄博明终于找到施展才干的出口。

“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尽管后来受到历次运动的冲击,饱受生活的磨难,但他依然以超常的能力和敬业精神,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认可。他曾说过,他在海南成家,海南成就了他后半生的事业,海南就是他的第二故乡。”蔡家万说。

以身赎罪,长眠海南

抗日战争历时之长,涉及之广,伤亡之惨重,前所未有!从东北到海南岛,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踏遍中国,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灾难。被卷入战争的日本人斋藤博明也在战争的漩涡中一度无助、迷茫,甚至曾经被迫助纣为虐。从战争中觉醒的斋藤博明用一生为他的民族赎罪,为自己负罪的心灵寻求解脱。

2000年一场大水冲垮南渡江铁桥,只剩下断桥残墩,作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掠夺海南岛资源的铁证,曾引来一时关注。时过境迁,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铁桥的设计者是日本人黄博明,而这个人居然就在岛上生活多年!黄博明与吴氏婚后生育四个儿女。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根、成长、结果。他们的相貌与生活方式跟本地人无异,却曾因为黄博明的日本人身份而变得不同。直到今天后辈们也无法完全理解黄博明的决定,但他们还是尊重黄博明的选择:

“晚年的爷爷曾多次回到日本,却每次都选择留在海南。最后一次是2007年初,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的爷爷告诉我们,百年之后一定要把自己葬在中国,葬在海南!”黄博明的孙子黄朝晖说。

2007年秋天,黄博明先生在海南去世,享年90岁。家人将他和他妻子埋葬在一起。已经高龄的新元久先生每年都到墓前来祭拜他。

2014年9月,新元久先生再次来到海南。他希望与黄博明的后人一起,共同为和平奔走呼吁。十几年前,黄博明将他的孙子黄朝晖和孙女黄雪丹送到日本学习,新元久以长辈的热心帮助他们,希望他们多

多了解日本,成为中日两国和平的见证人。

在琼海黄家墓地,新元久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我和斋藤先生有这么多书信的往来,书信中饱含了他战后很多的艰辛和痛苦。斋藤先生战争时在最前线,战后也没能回国,这是战争留给人的伤痛。我希望新元家、斋藤家的友谊能祖辈相传。我们不希望战争的悲剧重演。我们要和平而不是互相为敌。我们要平安幸福的日子。”通过翻译,我们依然能真切感受到新元久先生对战争的痛恨以及对和平的向往。

2015年9月,黄博明的孙子黄朝晖带着一双儿女来到爷爷设计的南渡江铁桥,行走在断桥上的黄家后人百感交集。那逝去的斋藤博明被卷入一场战争,而新生的黄博明却以自己一生的行动救赎自己的灵魂,以求得到永久的安宁。八年抗战,八年离乱,离乱的何止是被害者的人生? 大自然的伟力冲垮了铁桥,却冲不掉人们对战争恐怖的记忆。图



1984年,黄博明回到日本时留影。 黄朝晖 提供



黄博明的长子黄关熙指着父母照片叙述往事。

蒙钟德 摄